从考古资料看水吉建窑窑业生产

李　凯

内容提要　首先，本文基于水吉建窑及周边窑址发掘出土资料，分析晚唐五代时期建窑是在闽北、浙南、浙西、赣东北等内陆地区影响下兴起，并非源自福建沿海区域。其次，本文分析了福建黑釉瓷窑址的分布与产品构成，确认北宋中后期是建窑黑釉瓷生产的繁荣期，为满足城市市民需求，在生产和销售上实现了专门化；南宋中后期是建窑黑釉瓷生产的衰落期，由于销售路线受阻，黑釉瓷生产中心向闽江下游转移。最后，通过对比长江中下游和福建地区青白瓷窑址考古发现，指出南宋晚期建窑迅速转向青白瓷生产，并非由于饮茶方式转变，而是由于社会经济凋敝，建窑不得不生产青白瓷抢夺既有市场。

关键词　建窑　黑釉瓷　青白瓷　宋代　福建地区

建窑位于福建建阳市水吉镇，生产时段从晚唐五代至元代，自宋代以来，建窑生产的黑釉瓷器，备受文人名士赞誉。民国时期詹宣猷、刘达潜等人对建窑展开初步调查，1929年《建瓯县志》记载了建窑的所在地‹1›，1935年6月，美国人普拉玛（James Marshall Plumer）在建窑调查并采集了大量瓷片标本‹2›。20世纪50年代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福建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华东文物工作队相继对建窑展开考古调查工作‹3›。此后福建省博物馆、厦门大学、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建窑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对建窑遗址的内涵有了更全面的认识‹4›。

‹1›　詹宣猷、刘达潜《建瓯县志》卷二二，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第272页。

‹2›　［美］普拉玛《天目瓷考察》，《福建文博》1987年第1期，第73－76页。

‹3›　宋伯胤《“建窑”考察记》，南京博物院编《宋伯胤文集 陶瓷卷》，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293－294页。

‹4›　栗建安《建窑考古研究之回顾》，《福建文博》1993年第1、2期合刊，第94－98页。

学界对建窑的研究，体现在建窑的概念定义‹1›、烧造年代‹2›、器物特征与形成机理‹3›、产品性质‹4›，与其他窑址的关系‹5›及与茶文化的关系‹6›等方面。然而，以往研究多将黑釉瓷与建窑窑业的兴衰一同讨论，忽视了建窑本身发展的独特性。在对单一窑址展开研究时，在关注特色产品之外，还需要从整体上审视该窑址发展历程，将其放置于本地区窑业体系中加以分析，与周边地区窑业进行对比，才能得出更加全面的认识。

正因为建窑的生产还有探讨的空间，本文将以建窑考古出土资料为基础，结合周边地区窑业生产及流通情况，对建窑的创烧、繁荣、衰落各阶段展开分析，建窑不同阶段窑业生产的特点及形成原因，为其窑业的兴衰提出新的看法。

一　建窑早期生产

考古发掘证实，晚唐五代时期，建窑的庵尾山、牛皮仑、芦花坪等窑址已经开始生产瓷器，产品种类与后世建窑有较大区别。在1977年芦花坪窑址发掘的晚唐五代层中，出土有大量青釉瓷器，主要为碗类产品，灰胎质地疏松，釉色青中泛黄，施釉不及底，采用支钉叠烧‹7›。在1989－1990年庵尾山窑址的调查中，仅有青釉瓷发现，器类有莲瓣口碗、盘，胎色灰且疏松，釉层较薄，采用支钉叠烧，总体较

‹1›　叶文程《“建窑”初探》，《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146－154页；吕成龙《试论建窑的几个问题》，《文物》1998年第7期，第53－59页。李民举《建窑初论稿》，《“迎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考古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327－342页。

‹2›　叶文程《关于“建窑”几个问题的探讨》，《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3期，第129－136页；谢日万《建窑黑釉瓷创烧、兴盛和衰落的年代》，《东南文化》1992年第10期，第230－234页。

‹3›　中国硅酸盐学会《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277－284页；林忠干、谢道华、张文崟《建窑系黑釉碗类考》，《福建文博》1996年第2期，第18－32页；陈显求等《宋代建盏的科学研究》，《中国陶瓷》1983年第1期，第58－66页；陈显求、黄瑞福、陈士萍《供御油滴和龟背兔毫(建窑二绝)》，《河北陶瓷》1990年第4期，第9－13页；陈显求、陈士萍《建盏珍品的研究》，《景德镇陶瓷学院学报》1991年第4期，第25－32页；郭演仪等《建窑窑址发掘的宋代黑釉瓷片》，《’02古陶瓷科学技术国际讨论会论文集》，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27－135页；李达《论鹧鸪斑建盏》，《陶瓷学报》1998年第2期，第97－10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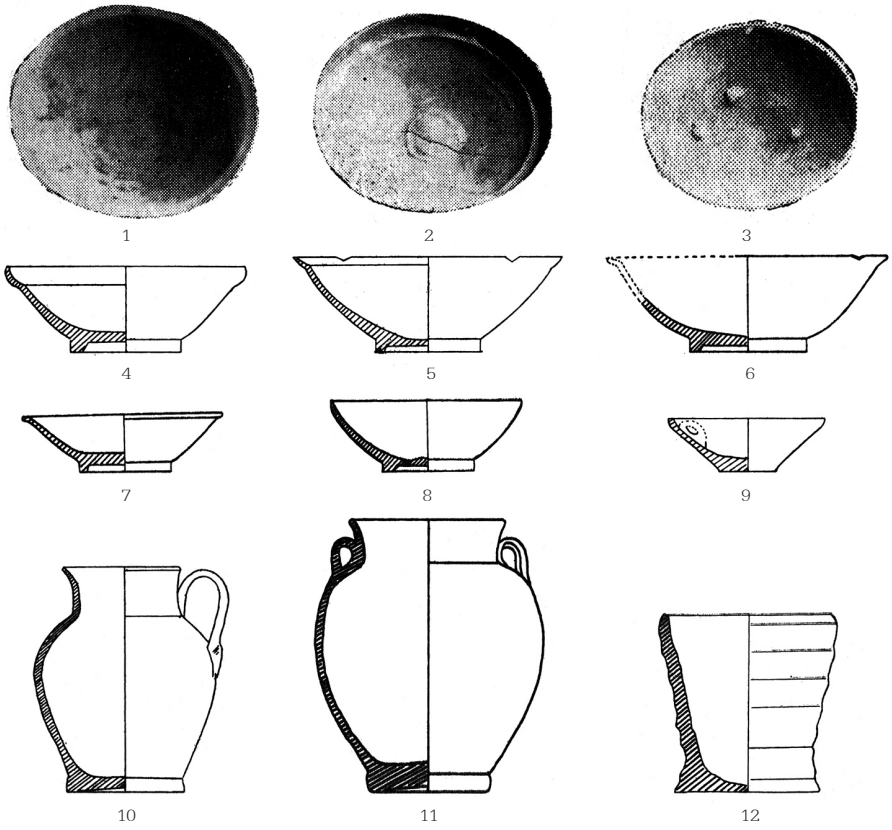
‹4›　顾文璧《建窑“供御”、“进(琖)”的年代问题宣和遗事“建溪异毫进(琖)”正误》，《东南文化》1986年第1期，第133－138页；谢道华《建窑瓷器文字符号初析》，《福建文博》1990年第2期，第88－89页；曾凡《建窑考古新发现及相关问题研究》，《文物》1996年第8期，第53－58页。

‹5›　邓宏文《吉州窑和建窑黑瓷的研究》，《湖南考古辑刊》1999年，第301－334页；梅华全、陈寅龙、林存琪《浦城、南平黑釉瓷与“建瓷”的区别》，《福建文博》1996年第2期，第37－41页；徐菁《江西黑釉瓷器溯源——兼浅析与建窑的关系》，《福建文博》1996年第2期，第79－81页；刘毅《宋代黑釉茶盏的窑口鉴别》，《福建文博》1996年第2期，第127－128页。

‹6›　沈芯屿《建窑与宋代福建茶文化》，《福建文博》1996年第2期，第43－46页；欧阳世彬《建窑兔毫盏与大云寺茶诗》，《陶瓷学报》1997年第3期，第176－183页。

‹7›　福建省博物馆、厦门大学、建阳县文化馆《福建建阳芦花坪窑址发掘简报》，《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137－145页。

〔图一〕芦花坪窑址第三层出土器物
1－8. 青釉碗　9. 青釉盏　10. 陶壶　11. 陶罐　12. 陶杯
采自前揭福建省博物馆、厦门大学、建阳县文化馆《福建建阳芦花坪窑址发掘简报》；叶文程《“建窑”初探》



北宋越窑、龙泉窑和婺州窑年代为早‹1›。1991－1992年的发掘则进一步证实了青瓷产品为当地所制，出土有盆、盘口壶、执壶、水注等器物，与建阳将口窑同类产品类似，同时还有酱釉、釉下褐斑器，发现黑釉与青釉共同烧制的现象‹2›。在对牛皮仑窑址的调查中，在堆积层内发现青釉、黑釉与白釉共存，并有重叠粘连现象，当是同一时间烧成。釉色以青釉为主，青釉多呈青黄、青灰色，也有部分质量较高，可与越窑媲美；黑釉釉层较厚，多见流釉现象，尚未达到后世建窑黑釉的效果；白釉数量极少，仅见个别碗类器物。器类以碗、盏为主，并采用花口、压棱等装饰‹3›〔图一〕。

建窑早期生产的器物，与晚唐五代时期闽北地区其他窑址产品面貌类似，如建阳将口窑‹4›、武夷山仙店窑‹5›、松溪山合窑‹6›等。这些地区产品多以青釉产品为主，生产碗、盘等日用器皿，采用支钉多件叠烧以及漏斗形匣钵单件装烧等装烧工艺。对于闽北地区生产的此类青釉瓷，以往多认为是越窑影响下生产，但越窑青瓷更偏向于淡青色偏灰，釉面光亮，施釉及足，只有在内底和外底圈足上留下细小的支烧痕；而闽北青瓷则是深绿色偏黄，釉面粗糙不均，有明显的缩釉及开片现象，施釉也往往不及底，采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福建省博物馆《福建建阳县水吉北宋建窑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第2期，第1095－1099、1089、1156－1157页。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福建省博物馆《福建建阳县水吉建窑遗址1991－1992年度发掘简报》，《考古》1995年第2期，第148－154、159、199页。

‹3› 傅宋良、张家、林忠干《福建建阳牛皮仑唐代窑址调查》，《江西文物》1990年第4期，第35－38页。

‹4› 福建省博物馆《建阳将口唐窑发掘简报》，《东南文化》1990年第3期，第135－141页。

‹5› 中国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福建博物院文物考古研究所、武夷山市博物馆《武夷山古窑址》，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70－75页。

‹6› 曾凡《福建陶瓷考古概论》，福建省地图出版社，2001年，第153页。

用较大块的支钉叠烧〔图二〕。这些区别曾被认为是工艺落后，制作粗糙所导致。但随着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可知，这类产品除闽北地区以外，在赣东北与浙西盆地也大量生产，代表性窑址有景德镇南窑‹1›与兰田窑‹2›、玉山渎口婺州窑‹3›、临川白浒窑‹4›、铅山江村窑‹5›、东阳歌山窑‹6›等。说明青釉瓷不应被单纯视作对越窑的粗糙模仿，而是本地区生产的一类大宗瓷器产品。除青瓷以外，在牛皮仑窑址发现了青釉、黑釉以及白釉共存并粘连的现象，这种组合关系亦在本地区其他窑址中有发现，例如兰田窑也发现了青绿釉与仿越窑青釉、仿越窑青釉与白釉叠烧的现象〔图三〕。晚唐五代时期，闽浙赣三省交界区的窑业具有一定相似性，有学者提出应视为一个整体生产区‹7›，建窑的早期生产应放在这一生产区下进行审视。

〔图二〕将口窑出土青釉瓷
本图片由福建省考古研究院羊泽林先生提供



〔图三〕景德镇兰田窑出土白釉与青灰釉瓷叠烧标本
采自《景德镇早期窑业的探索——兰田窑发掘的主要收获》，《南方文物》2015年第2期，第128－137页



笔者尝试将这一时期福建地区窑业分布情况，与福建地区交通路线进行拟合〔图四〕，有以下发现。首先，窑业分布基本集中在闽浙赣交界区域与闽东、闽南沿海区域，而广大的福建内陆地区还有大片空白。其次这些窑址基本分布在交通干线与港口附近，在当时都具有便利的陆上或水上交通条件，其中陆上交通包括从光泽入赣到达南昌的“杉关路”，从建阳、崇安到达上饶、

‹1› 张文江、崔涛、顾志洋《景德镇南窑遗址考古发掘的主要收获》，《景德镇南窑考古发掘与研究：2014年南窑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1－79页。

‹2› 秦大树、刘静、江小民等《景德镇早期窑业的探索——兰田窑发掘的主要收获》，《南方文物》2015年第2期，第128－137页。

‹3›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西玉山渎口婺州窑址》，文物出版社，2008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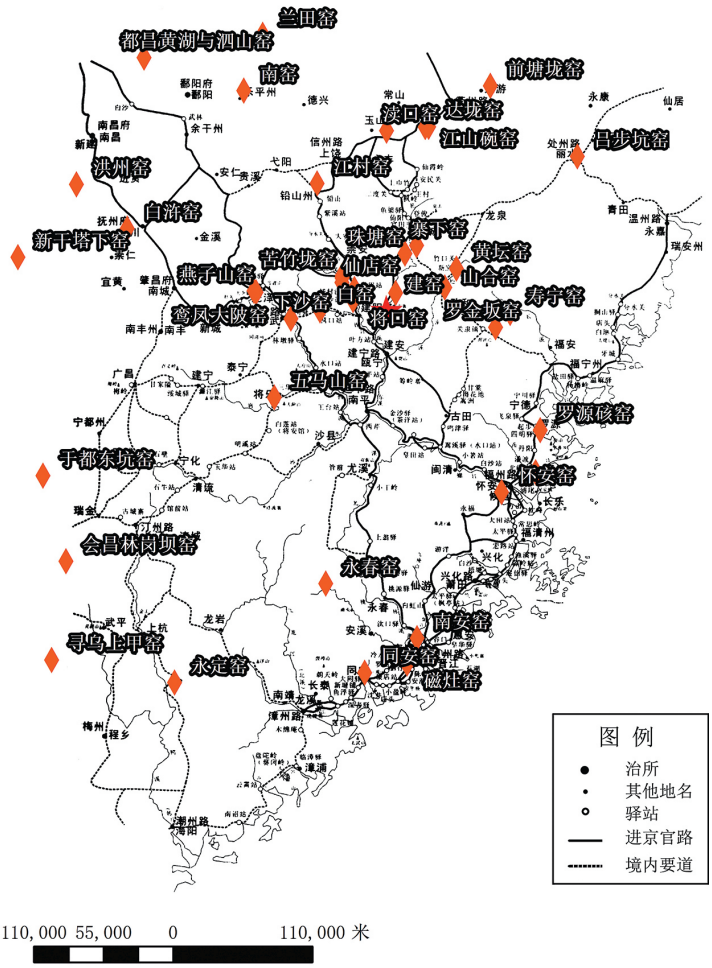
‹4› 杨后礼《临川县白浒窑调查》，《江西考古资料汇编(瓷窑址及出土瓷器部分)》，1977年，第15页。

‹5› 余家栋《江西陶瓷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91－292页。

‹6› 贡昌《记浙江东阳歌山唐宋窑址的发掘》，载氏著《婺州古瓷》，紫禁城出版社，1988年，第73－91页。

‹7› 王轶凌、郑建明《隋唐时期浙江地区窑业的时空特征》，《东南文化》2015年第2期，第82－88页。

〔图四〕唐五代时期福建地区窑址与交通路线示意图
改绘自林汀水《福建古代陆路交通干线的开辟与变化》，第227页



衢州的“分水关路”，从浦城至衢州的“仙霞岭路”，从浦城前往温州、杭州的“浦城路”等[1]；水上交通则分别通过闽江、晋江，从福州、泉州等港口出海，窑址分布于此，既便于生产时的人员流动、技术交流，也便于销售时的产品流通。最后针对闽北地区窑业分布，在上述主要交通干线上，窑址分布较为均匀，并未出现在某条线路上窑址集中的现象，大部分窑址生产规模普遍不大，产品种类上都以青绿釉瓷为主，生产少量白瓷，生产工艺上也较为相似。虽然福建沿海区域如福州怀安窑、磁灶溪口山窑等窑址在南朝时期就已开始生产[2]，但闽北地区始终未受其影响生产瓷器，直到晚唐五代时期，在浙南、浙西、赣东北等地的影响下，包括建窑在内的闽北地区窑业才开始兴起。通过便利的陆路交通，闽北地区既与周边地区进行了广泛地窑业技术交流，同时也形成了一个区域性的销售市场，为后世建窑的繁荣生产奠定了基础。

二　建窑黑釉瓷生产

入宋以后，建窑开始转向生产黑釉瓷器，且最晚在北宋中期进入繁荣阶段，对周边地区窑业产生强烈影响。在建瓯水吉镇，生产建窑黑釉瓷的窑址从原有的芦花坪、庵尾山，扩展到芦花坪、大路后门、庵尾山、牛皮仑、源头坑、营长垅等诸个地点〔图五〕，每个地点都有多座窑炉相互叠压打破。单个窑址的生产规模也有显著增加，最具代表性的是大路后门Y3，长度达135米，是迄今为止国内发现最长的龙窑窑炉。据推算，芦花坪窑址全窑单次可烧造瓷器30000件以上[3]，庵尾山窑址Y8单次可烧造25000件，大路后门Y4窑炉单次即可烧造10万件器物[4]。

‹1› 林汀水《福建古代陆路交通干线的开辟与变化》，载氏著《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丛书 福建历史经济地理论考》，天津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27页。

‹2› 曾凡《福建南朝窑址发现的意义》，《考古》1989年第4期，第363－36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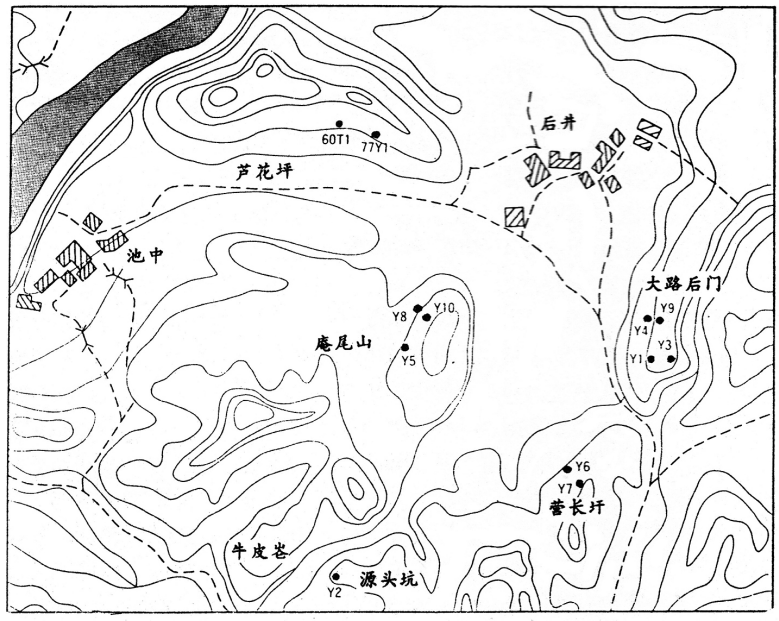
‹3› 前揭福建省博物馆、厦门大学、建阳县文化馆《福建建阳芦花坪窑址发掘简报》。

‹4› 前揭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福建省博物馆《福建建阳县水吉北宋建窑遗址发掘简报》。

相较于早期以生产青釉日用器为主的情况，此时的建窑在产品种类上有明显变化，产品以黑釉瓷为主，碗占据器形总数的99%，有极少数的灯、罐、钵、瓶、碟等器物[1]。在装饰方面，建窑也舍弃了刻划、堆贴、花口等装饰方式，转而采用“天成造作”的窑变装饰工艺，包括诸如兔毫〔图六、〔图七〕、油滴、鹧鸪斑〔图八〕、铁锈斑〔图九〕等装饰[2]。在装烧工艺上，建窑采用漏斗形匣钵垫饼单件装烧，以往青釉瓷与白釉瓷所使用的支钉叠烧工艺基本消失。

此外在芦花坪、大路后门、营长垱等窑址发现的黑釉碗，底足带有“供御”、“进琖”等刻划或印文；同时在用于承托器物的垫饼上，亦有刻划或戳印的反文，这在建窑以外窑场都不曾见到。早年宋伯胤在“水尾岚”调查时，发现了众多印有“供御”铭文的建盏，该地点位于池墩村前往县城的水陆要道，传说是挑选瓷器的堆栈[3]。1992年建窑联合考古队对该地进行了发掘，发现黑釉盏凡是带圈足的都刻有“供御”款，甚至还有火候不足的次品包含其中。

〔图五〕水吉镇建窑遗址分布情况
采自前揭曾凡《福建陶瓷考古概论》，第153页



〔图六〕大路后门窑址出土黑釉兔毫碗
采自张柏主编《中国出土瓷器全集 福建》，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33页



〔图七〕芦花坪窑址出土黑釉兔毫碗
采自前揭张柏主编《中国出土瓷器全集 福建》，第134页



〔图八〕建阳县池墩建阳瓷厂后壁外路床出土宋代“供御”铭鹧鸪斑黑釉盏残片
采自福建省文物局、福建省文物鉴定中心《玄之妙 福建宋元黑釉瓷》，福建美术出版社，2016年，第35页



〔图九〕大路后门窑址出土黑釉酱彩碗
采自前揭张柏主编《中国出土瓷器全集 福建》，第132页



‹1› 前揭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福建省博物馆《福建建阳县水吉建窑遗址1991－1992年度发掘简报》。

‹2› 有学者认为此类装饰风格与伊斯兰马赛克玻璃器的装饰类似，但这是否说明建窑的装饰风格受到外来影响，仍有待考证。谢明良《宋人的陶瓷赏鉴及建盏传世相关问题》，《陶瓷手记2 亚洲视野下的中国陶瓷文化史》，台北：石头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第215－236页。

‹3› 前揭宋伯胤《“建窑”考察记》，第293－294页。

〔图十〕北苑遗址出土瓷器
采自愛知県陶磁資料館《東アジアの海とシルクードの拠点 福建》，東方書店，2008年，第78页



通过以上归纳可知，相较晚唐五代时期，建窑在入宋以后生产规模迅速扩大，在产品种类、装饰和工艺上发生了很多创新，具有一定专门生产的特征，还有为满足“供御”需求的非商品性生产。

那么，建窑的黑釉瓷为何在短时间内迅速走向繁荣呢？根据以往的研究，这是源自当地斗茶风俗的兴起。晚唐时期冯贽在《记事珠》中曾记载，“建人谓斗茶为茗战”‹1›，可见斗茶晚唐时期就已在当地流行。及至北宋仁宗时期，蔡襄《茶录》有记：“茶色白宜黑盏，建安所造者绀黑，纹如兔毫，其坯微厚，熁之久热难冷，最为要用。”‹2›考虑到蔡襄著《茶录》的动机之一，就是宋仁宗屡次询问“建安贡茶并所以试茶之状”，可以肯定至少在北宋中期当地已使用建盏斗茶。

但是，从晚唐到北宋仁宗朝跨越了150年，不足以解释某种产品的一时风靡，更何况当时的斗茶不仅仅使用建盏。前述冯贽《记事珠》记载建人斗茶之事为晚唐，而建窑是在北宋中后期大规模生产黑釉碗，所以在此之前斗茶主要采用其他釉色瓷器。根据1995年福建省博物馆对建瓯北苑遗址的发掘，出土仿龙泉青釉碗占大多数；且最早的地层为五代、北宋时期，出土遗物有褐釉罐、青釉浅腹碗等，并未发现建窑黑釉瓷器；而可能用于斗茶的黑釉束口碗，实际上多发现在南宋建筑F10中。因此北苑遗址中并未发现早于北宋中期的建窑黑釉器，且龙泉与仿龙泉青瓷在北苑遗址的各个时期都较为流行〔图十〕‹3›。这意味着，在北宋中期以前，甚至到了建窑黑釉瓷开始大规模生产的北宋中后期，青瓷可能才是当地较为流行的饮茶器皿。因此建窑迅速大规模生产黑釉瓷，并不能归因为斗茶的需要，这一特殊现象还有更深层次原因。

探究建窑生产黑釉瓷的原因，需要将建窑黑釉瓷放在同时期本地区窑业技术体系中，以更宏观的视角加以认识。观察宋元时期福建烧造黑釉瓷的窑址分布后发现〔图十一〕，福建地区生产黑釉瓷的窑址，主要集中于闽北和福州周边地区，其中闽北地区主要集中在松溪、崇阳溪、南浦溪流域，福州周边则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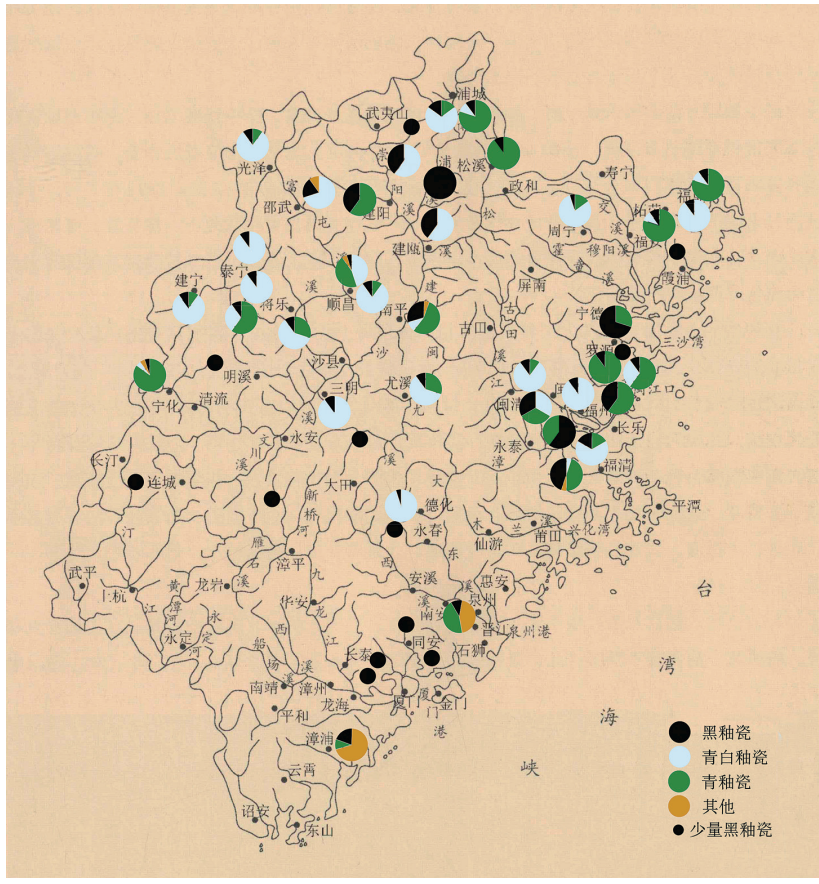
‹1› （唐）冯贽《记事珠》，《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农业出版社，1981年，第220页。

‹2› （宋）蔡襄撰，唐晓云点校《茶录：外十种》，《茶录·论茶器》，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第1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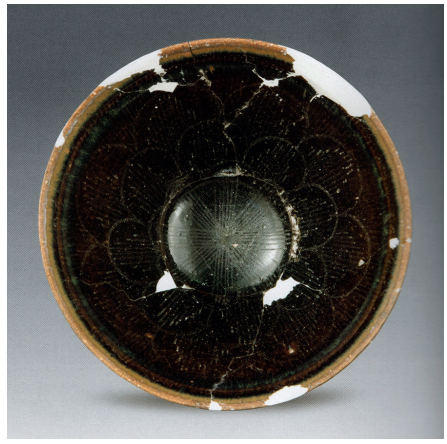
‹3› 福建省博物馆《福建建瓯北苑遗址第一、二期发掘简报》，《福建文博》1996年第1期，第35—44页。

中在闽江口附近。松溪流域在交通上可前往浙江龙泉，受龙泉窑影响较大，例如松溪西门窑[1]，产品以仿龙泉青釉为主；但同时建窑黑釉生产也影响到省外沿线，例如专烧黑釉仿建窑产品的庆元潘里垅窑[2]。南浦溪流域在交通上对应“仙霞岭路”，建窑也位于此附近。崇阳溪沿岸在交通上对应“分水关路”，有烧造仿建窑黑釉瓷的遇林亭窑[3]，尤以黑釉金彩[4]的茶碗最为引人注目〔图十二〕，省外沿线也有生产仿建窑和吉州窑黑釉瓷为主的铅山盏窑[5]。在福州周边地区，则集中了闽侯碗窑山Y1[6]、闽侯龙潭山[7]、闽侯鸿尾窑[8]、福清东张窑[9]、连江浦口窑[10]等以仿建窑黑釉盏作为重要产品的窑场〔图十三〕。位于三都澳附近的宁德飞鸾窑[11]也以生产黑釉瓷

〔图十一〕福建地区宋元时期黑釉瓷窑址分布图
图改绘自前揭福建省文物局、福建省文物鉴定中心《玄之妙：福建宋元黑釉瓷》，第7页



〔图十二〕武夷山遇林亭窑址出土黑釉描金（银）彩花卉纹盏
采自福建省博物馆《玄之妙·福建宋元黑釉瓷》，福建美术出版社，2016年，第50页



‹1› 羊泽林、杨敬伟《福建松溪县西门窑发掘收获》，《东方博物》2017年第3期，第65－75页。

‹2› 刘建安《2011年浙江丽水庆元县潘里垄宋代窑址考古发掘》，《陶瓷考古通讯》2013年第1期，第14页。

‹3› 福建省博物馆《武夷山遇林亭窑址发掘报告》，《福建文博》2000年第2期，第20－49页。

‹4› 早年普拉玛的调查中曾发现建窑黑釉金彩产品，在后来的建窑大路后门窑址的发掘中也有出土建窑黑釉金彩碗，因此遇林亭窑址黑釉金彩器物，可能也是受到建窑的影响。

‹5› 王立斌《江西铅山盏窑略考》，《南方文物》1997年第3期，第110－114页。

‹6› 福建博物院《福建闽侯县碗窑山宋代窑址的发掘》，《考古》2014年第2期，第54－78页。

‹7› 福建省文物局、福建省文物鉴定中心《玄之妙：福建宋元黑釉瓷》，福建美术出版社，2016年，第2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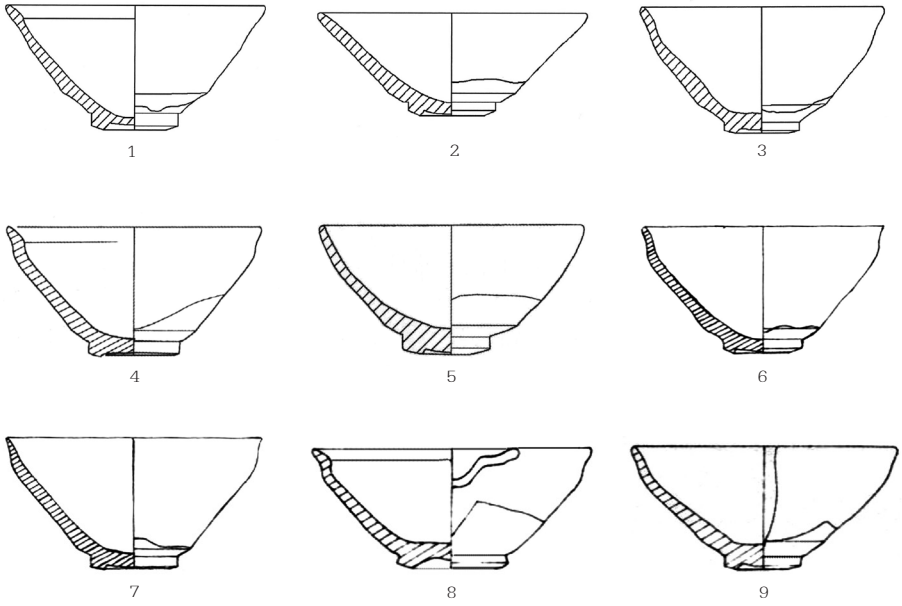
‹8› 前揭福建省文物局、福建省文物鉴定中心《玄之妙：福建宋元黑釉瓷》，第27页。

‹9› 福州市博物馆、福州市文物考古工作队《福清东张两处窑址调查》，《福建文博》1998年第2期，第66－68页。

‹10› 栗建安、陈恩、明勇《连江县的几处古窑址》，《福建文博》1994年第2期，第74－81页。

‹11› 张登贤、钟亮《宁德飞鸾窑初探》，《福建文博》1996年第2期，第64－66页。

〔图十三〕福州地区出土黑釉碗
1－3. 闽侯碗窑山窑　4－5. 闽侯鸿尾窑
6－7. 福清东张窑　8－9. 连江浦口窑
1－3. 采自前揭福建博物院《福建闽侯县碗窑山宋代窑址的发掘》，第60页
4－5. 采自前揭福建省文物局、福建省文物鉴定中心《玄之妙：福建宋元黑釉瓷》，第27页
6－7. 采自前揭福州市博物馆、福州市文物考古工作队《福清东张两处窑址调查》，第68页
8－9. 采自前揭栗建安、陈恩、明勇《连江县的几处古窑址》，第80页



器为主，大量生产仿建窑的黑釉盏。三都澳位于福州和庆元港之间，自古以来就是优良海港，是闽东地区重要出海通道。此外在浙南地区的温州泰顺玉塔窑、苍南大星垟窑也烧造少量仿建窑黑釉瓷[1]，可能也是通过海运向外销售。

通过上述比较可以得知，福建地区黑釉瓷的生产多集中在福建的交通要道及途经区域，其中向北的陆路以及福州港的海路应是黑釉瓷销售的主要路线。且建窑是当时极少数专门生产高质量黑釉瓷的窑场，虽然例如遇林亭窑、五渡桥窑、白马前窑、闽侯碗窑山窑也以黑釉瓷为主要产品，但同时依然生产青釉、青白釉、酱釉、素胎等日用器，这种现象在福州周边区域更为明显，因此这些窑址并非专门生产黑釉瓷，在仿制建窑的质量上自然受到制约，正如《茶录》对建窑以外黑釉瓷的评价："出他处者，或薄或色紫，皆不及也。"

如果考察宋元时期东南沿海沉船出水黑釉瓷情况，会发现出水黑釉瓷大部分来自福州周边的福清东张窑，也有来自闽北的遇林亭窑、五渡桥窑，还有的来自闽南地区晋江磁灶窑[2]。从沉船出水情况看，这些出水的黑釉瓷器往往集中放置于一处〔图十四〕，作为商品货物大规模销售，但是生产规模更大的建窑并没有此类大规模出水情况，不得不视作是一种特殊现象。生产规模更大，生产更为专门，生产质量更高的建窑黑釉瓷，却从未有大批量的发现，这是否说明建窑与其他地区的黑釉瓷不同，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从建窑的流布情况来看，建窑除了在闽北地区以及江西、广东、浙江、江苏、湖北、陕西、黑龙江、内蒙

‹1›　方忆《宋元时期浙江地区的黑瓷生产及其相关问题初探》，《东方博物》2014年第4期，第61－6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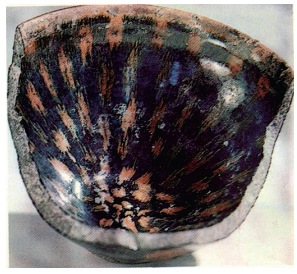
‹2›　栗建安《水下考古发现的福建古代黑釉器》，深圳博物馆编《中国古代黑釉瓷器暨吉州窑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19年，第150－159页。

古等地墓葬出土之外‹1›，集中发现于福州‹2›、泉州‹3›、杭州‹4›、宁波‹5›、湖州‹6›、镇江‹7›、张家港‹8›等沿河沿海城市遗址之中〔图十五〕。在元代晚期驶向日本的新安沉船上出水的建窑黑釉瓷器，也应是从宁波、杭州等城市中获得‹9›。因此建窑黑釉瓷的销售，可能并非像其他窑址的黑釉瓷通过港口进行集中大规模水运，而是运往城市后进行分散小规模的陆运或水运。城市既是当时的商贸中心，也是文人雅士集中的文化中心，因此成为建窑黑釉瓷最主要的消费地。作为当时最有名的特色茶器，建窑大规模集中生产黑釉瓷，应主要是为了满足这些城市中的士大夫与市民阶层对于高端茶器的需求。而其他窑址觊觎建窑黑釉瓷的畅销，在生产一般日用器的同时，利用其丰富的原料与既有生产工艺，大量烧造仿建窑的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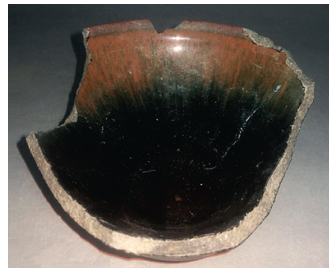
〔图十四〕连江定海“白礁一号”黑釉瓷器堆积
采自前揭栗建安《水下考古发现的福建古代黑釉器》，第151页



〔图十五〕城市遗址中出土建窑黑釉瓷
1. 福州五代夹道遗址　2. 泉州后府山遗址　3. 泉州清净寺奉天坛基址
4. 杭州东南化工厂　5. 杭州南宋太庙遗址　6. 宁波明州罗城遗址



1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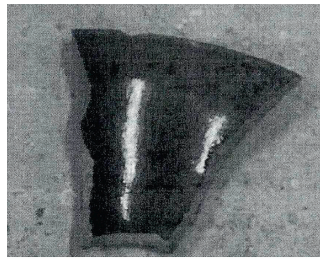
3



4



5



6

‹1› 桂冠《建窑黑釉瓷器研究》，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

‹2› 福建省博物馆考古部、福州市文物考古工作队《福州五代夹道遗址发掘简报》，《福建文博》1994年第2期，第34－55页。

‹3› 泉州市考古队、泉州市文物保护研究中心《2019年泉州府后山遗址考古收获》，《福建文博》2020年第2期，第11－17页；福建博物院、泉州市考古队《泉州古城考古发现综述》，《福建文博》2020年第1期，第6－15页。

‹4› 牟宝蕾《对杭州南宋遗址出土定窑、建窑瓷器的再认识》，《东方博物》2017年第1期，第62－73页；牟宝蕾《杭州南宋遗址出土瓷器刍议》，《东方博物》2016年第1期，第24－44页；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临安城遗址考古发掘报告 南宋太庙遗址》，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62－63页；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临安城遗址考古发掘报告 南宋临安府治与府学遗址》，文物出版社，2013年，第80－82页；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临安城遗址考古发掘报告 南宋御街遗址 上》，文物出版社，2013年，第79页；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临安城遗址考古发掘报告 南宋御街遗址 下》，文物出版社，2013年，第30、54、114、181、207页。

‹5› 苏新贵《明州罗城城墙遗址（望京门段）出土黑釉瓷器的初步分析》，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

‹6› 刘建安《浙江湖州寺前宋元遗址》，《大众考古》2015年第10期，第12－13页。

‹7› 镇江古城考古所《镇江市解放路宋代灰坑清理简报》，《南方文物》1996年第1期，第25－31页。

‹8› 高伟《鉴真第六次东渡和黄泗浦遗址》，《中国文化遗产》2013年第1期，第70－81页。

‹9› 范佳楠《新安沉船与东亚海上贸易》，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8年。

〔图十六〕营长墘窑址出土青白瓷残片
采自福建省博物馆、MOA美術館、茶道資料館《唐物天目 福建省建窯出土天目と日本伝世の天目》，1994年，第102页



釉瓷器，通过便捷的交通运往各地。

因此笔者认为建窑的黑釉瓷，与同时期其他窑址生产的黑釉瓷大为不同，生产规模大，专门化程度高，基本不包含其他釉色日用瓷器；同时销售上运往大城市，再由大城市散运至各地，并非通过港口集中大规模运输。正是由于市民阶层需求这样的经济原因，加之朝廷贡御和斗茶文化提供助益，才使得建窑黑釉瓷生产得以迅速繁荣。

三　建窑黑釉瓷停烧与青白瓷生产

南宋晚期到元代，建窑迅速步入衰落。在兴盛期大规模生产的几个窑址突然停产，转而生产与景德镇产品类似的青白釉日用器。在窑炉长度上迅速缩小，如营长墘Y6不足50米，不仅无法与百米以上的兴盛期龙窑相比，甚至小于晚唐五代时窑炉的长度。而在器物种类上，几乎都是青白瓷，器形包括碗、盘、洗、炉、罐、壶、瓶、盖等日用器。装饰手法以印花为主，有少量刻划花纹。而在装烧上采用支圈覆烧与涩圈叠烧〔图十六〕。这样从生产对象、生产技术到生产方式的巨变，几乎看不到黑釉瓷生产的痕迹。

关于建窑衰落的原因，学者从不同的角度予以解析，包括元代茶风的变化、审美观念的变化以及其他窑址外销黑釉瓷的竞争等‹1›。虽然这些都是建窑衰落重要原因，却难以解释建窑黑釉瓷为何在南宋晚期突然停烧，也无法解释为何建窑彻底转向生产青白瓷。

更何况宋元饮茶方式的嬗变过程也并非一蹴而就，元代王祯《农书》‹2›、忽思慧《饮膳正要》‹3›亦有对点茶法的记载，《明太祖实录》卷二一二的记载庚子诏“罢造龙团，惟采茶芽以进”‹4›，直到明初方有罢贡龙团凤饼一事。建窑在南宋晚期的突然衰落，或许还另有原因？

建窑产品剧变的原因，还是应当放在当时本地区窑业技术体系的变化中加以思考。如果将观察的范围扩大，则发现此时福建地区的黑釉瓷生产中心开始向南转移。在闽北地区，除建窑外其他窑址黑釉瓷

‹1›　谢日万《建窑黑釉瓷创烧、兴盛和衰落的年代》，《东南文化》1992年第10期，第230－23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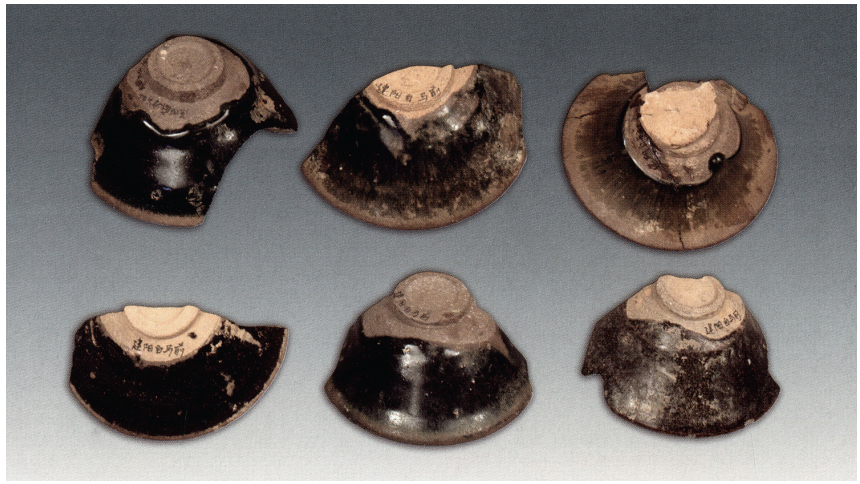
‹2›　（元）王祯《东鲁王氏农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324页。

‹3›　（元）忽思慧《饮膳正要》卷二，人民卫生出版社，1986年，第58页。

‹4›　《明太祖实录》卷二一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3144页。

生产也陷入低谷，如同样作为黑釉瓷生产中心的遇林亭窑址，在南宋晚期以生产青白瓷为主‹1›。这期间兴起的建阳白马前窑〔图十七〕‹2›、建瓯渔村窑‹3›、南平茶洋窑〔图十八〕‹4›以及五渡桥窑‹5›等窑址，产品主要以青白釉、青釉瓷为主，只兼烧部分酱黑釉瓷。而在闽江中下游以及闽东沿海区域，黑釉瓷生产仍较为兴盛，在福州周边的闽侯碗窑山Y2－Y4‹6›、闽侯龙潭山窑‹7›、闽侯南屿窑‹8›、福清东张窑‹9›、连江浦口窑〔图十九〕‹10›、福州长柄窑‹11›亦有黑釉器生产，且部分窑址以黑釉

〔图十七〕白马前窑出土黑釉瓷
采自前揭福建省文物局、福建省文物鉴定中心《玄之妙 福建宋元黑釉瓷》，第179页



〔图十八〕南平茶洋窑出土黑釉瓷
采自前揭福建省博物馆、MOA美術館、茶道資料館《唐物天目 福建省建窯出土天目と日本伝世の天目》，第87页



‹1› 前揭福建省博物馆《武夷山遇林亭窑址发掘报告》，第47页。

‹2› 前揭福建省文物局、福建省文物鉴定中心《玄之妙 福建宋元黑釉瓷》，第11页。

‹3› 建瓯县文化馆《福建建瓯小松宋代窑址调查简报》，《福建文博》1983年第1期，第72－77页。

‹4› 福建省博物馆《南平茶洋窑址1995年－1996年度发掘简报》，《福建文博》2000年第2期，第50－59页。

‹5› 中国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福建博物院文物考古研究所、武夷山市博物馆《武夷山古窑址》，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137－178页。

‹6› 福建博物院《福建闽侯县碗窑山宋代窑址的发掘》，《考古》2014年第2期，第54－78页。

‹7› 前揭福建省文物局、福建省文物鉴定中心《玄之妙 福建宋元黑釉瓷》，第26页。

‹8› 林登翔《福建闽侯硪油宋代瓷窑调查》，《考古》1963年第1期，第54－55页。

‹9› 福州市博物馆等《福清东张两处窑址调查》，《福建文博》1998年第2期，第66－68页；欧阳希君《中国福建古陶瓷标本大系——福清窑》，福建美术出版社，2005年。

‹10› 前揭栗建安、陈恩、明勇《连江县的几处古瓷窑址》，第74－81页。

‹11› 福州市文物考古工作队《福州长柄窑遗址考古收获与认识》，《福建文博》2005年增刊，第57－63页。

〔图十九〕连江浦口窑出土黑釉瓷
采自前揭福建省文物局、福建省文物鉴定中心《玄之妙 福建宋元黑釉瓷》，第190页



瓷为主要产品。尽管这些窑址生产的黑釉瓷，在造型、胎质、釉色、工艺都与建窑十分接近，但是制作上开始变得粗糙，出现了口沿上涂一周青釉或白釉的“白覆轮”，以及采用多次施釉工艺的“灰被天目”等产品，同时器物施釉仅至下腹，露胎部分有明显修坯痕甚至跳刀痕，装烧上除匣钵单件装烧外，出现了芒口覆烧、涩圈叠烧等粗制产品，各地仿建窑产品质量出现下降，普遍缺乏以往建窑厚重沉稳的风格；并且黑釉瓷与其他釉色日用瓷器共同烧造，再加之芒口覆烧、涩圈叠烧产品的出现，代表此类产品追求生产规模与数量，与以往仿建窑追求质量的情况不同。有学者提出元灭南宋后，临安失去了国内政治经济中心地位，上供物资路线改为从福州水运，由此建窑衰落而茶洋窑兴起‹1›。而通过前文的分析，启示我们可能至少在南宋晚期，北上的陆路就已经不再作为黑釉瓷销售的主要线路，而位于闽江沿岸及福州港附近的窑址基于便利的水运，成为新的黑釉瓷生产中心。

物资路线的变化，背后具有深刻的社会经济动因。经济史界认为以“开禧北伐”失利所导致的嘉定纸币贬值风潮为界标，南宋社会经济进入了衰落状态‹2›。正如前文分析，建窑的兴起主要在于城市对建窑黑釉瓷的需求，而这一需求可能随着南宋晚期经济衰落而萎缩。迫于财政压力，南宋朝廷不断扩大财政收入，默许地方州县巧立名目，横征暴敛。作为重要的地方特产，建窑很可能成为官府强取征税的对象。在南宋晚期景德镇制瓷手工业者就需缴纳“宪之头子，泉之率分，统制之供给，经总之移用，州之月桩、支使、醋息、镇之吏俸、孤遗、作匠，总费月钱几三千余缗”，甚至“上司限期稍不如约，则牙校踵门以相蠹”‹3›，这种情况估计在建窑所在的水吉镇也同样适用‹4›。

‹1› 前揭李民举《建窑初论稿》，第335页。

‹2› 葛金芳《农商社会视野下的南宋经济再评价》，《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16年第3期，第69－87页。

‹3› 白焜《宋·蒋祈《陶记》校注》，《景德镇陶瓷》1981年第10期，第36－52页。

‹4› 前揭白焜《宋·蒋祈《陶记》校注》。

更何况当时的州县迫于财政压力，在重要商路巧立名目，对各地特产商品随意征税，对于客商大幅收税，导致商路不通。宋孝宗《条具收税违法事项诏》载："客贩本是低贱或些小物货，却因其名色，抬作贵细，仍以一为百，以十为千，谓之花喝……所收商税，专责见钱，缘督逼紧急，商旅无所从得……"[1]这样的行为，严重阻碍了闽北地区黑釉瓷的销售，由此不得不在生产路线和生产方式上进行转变。在北上陆路受阻的情况下，黑釉瓷的生产中心向南转移，同时生产上追求数量而不注重质量，通过闽江的水运及福州海运路线，黑釉瓷与其他日用瓷共同作为大宗商品运往海内外各地。

而建窑生产青白瓷的原因，应当与南宋晚期青白瓷生产技术向外传播有关。南宋晚期景德镇青白瓷生产工艺，沿抚河流域向南传播，分别在临近福建富屯溪、沙溪源头的金溪（贵溪）以及宁都区域形成窑业生产区，包括金溪小陂窑与里窑[2]、贵溪坝上窑[3]、南城云市窑[4]，以及宁都地区的新圩水电站窑、固村桃布窑、固村三道窑、黄陂山堂窑、固厚小洋旻窑等[5]。这些窑址在以生产青白瓷为主的同时，也生产一定数量的黑釉瓷，在金溪小陂天金包、宁都东山坝等窑址发现带有兔毫窑变装饰的黑釉碗。经富屯溪、沙溪，青白瓷生产工艺传入福建，从而在闽江上游区域形成一片青白瓷生产区，包括光泽茅店窑[6]、顺昌河埒窑[7]、顺昌连坑窑与谢屯窑[8]、建瓯小松窑[9]、浦城大口窑[10]、武夷山崩埂窑[11]、建阳建窑与华家山窑[12]、宁化泉上窑与济村窑等。这些窑址产品以青白瓷为主，并生产部分青釉与酱釉瓷，产品类型较为一致，都采用印花为主的装饰技法，使用支圈覆烧与涩圈叠烧工艺进行装烧〔图二十〕。随后本地区窑业进一步向

‹1› 《条具收税违法事项诏》，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235册，卷5258，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第352页。

‹2› 陈定荣、李宗宏《金溪县的两处古瓷窑》，《江西历史文物》1982年第4期，第25－30页。

‹3› 陈定荣、于家栋《贵溪坝上窑的调查》，《江西历史文物》1982年第1期，第26－30页。

‹4› 胡义慈《南城县株良公社古窑址调查记》，《文物工作资料》1964年第3期，第4页。

‹5› 杨秋琳《宁都县古窑址调查与初步研究》，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

‹6› 林忠干《福建光泽茅店窑的瓷业成就》，《东南文化》1990年第3期，第190－193页。

‹7› 陈建标、林长程《顺昌河埒宋窑调查》，《福建文博》1990年第2期，第36－39页。

‹8› 林长程、陈建标《福建顺昌发现宋元窑址》，《考古》1990年第2期，第184－18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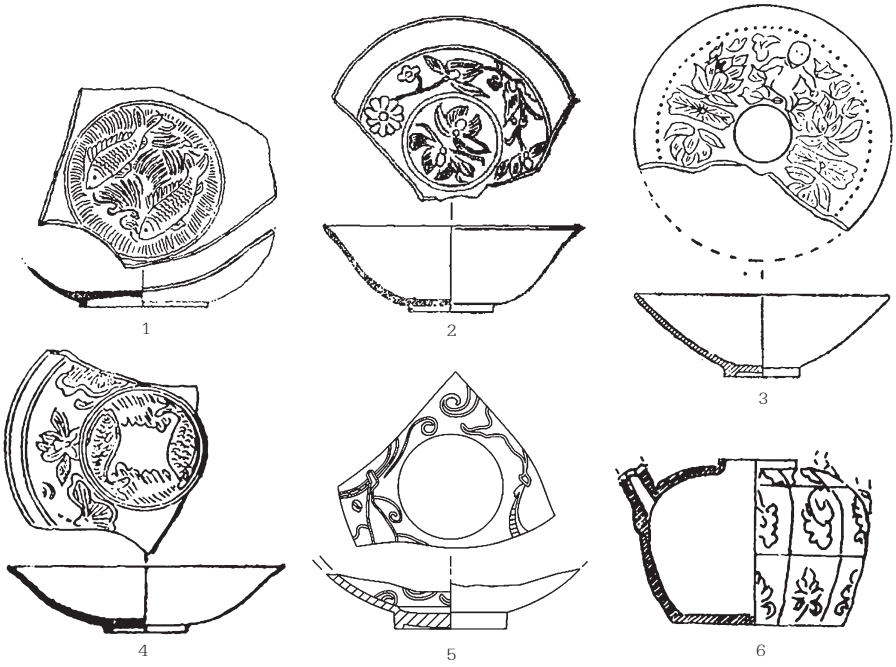
‹9› 前揭建瓯县文化馆《福建建瓯小松宋代窑址调查简报》。

‹10› 林忠干、赵洪章《福建浦城宋元瓷窑考察》，《中国古陶瓷研究》第二辑，紫禁城出版社，1988年，第63－71页。

‹11› 中国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福建博物院文物考古研究所、武夷山市博物馆《武夷山古窑址》，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127－136页。

‹12› 林忠干、王治平《福建建阳古瓷窑址调查简报》，《考古》1984年第7期，第636－648页。

〔图二十〕闽北窑址出土南宋时期青白瓷
1. 光泽茅店窑　2. 顺昌连坑窑与谢屯窑　3. 建瓯小松窑
4. 浦城大口窑　5. 武夷山崩埂窑　6. 建阳华家山窑
1. 采自前揭林忠干《福建光泽茅店窑的瓷业成就》，第191页
2. 采自前揭林长程、陈建标《福建顺昌发现宋元窑址》，《考古》1990年第2期，第185页
3. 采自前揭建瓯县文化馆《福建建瓯小松宋代窑址调查简报》，第73页
4. 采自前揭林忠干、赵洪章《福建浦城宋元瓷窑考察》，第67页
5. 采自前揭中国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福建博物院文物考古研究所、武夷山市博物馆《武夷山古窑址》，第134页
6. 采自林忠干《关于蒋祈〈陶记〉所载的“建阳窑”》，载中国古陶瓷研究会编《中国古陶瓷研究》第四辑，紫禁城出版社，1997年，第104页



内地山区发展，入元后包括邵武四都窑‹1›、将乐南口窑‹2›、中村回瑶窑‹3›、泰宁新桥窑‹4›等窑址逐渐兴起。

南宋后期蒋祈《陶记》载：“予观数十年来官斯去者，无不有州家挂欠之籍，盖尝推求其故，则有由矣。窑家作辍，与时年丰、凶相为表里一也；临川、建阳、南丰他产有所夺二也”，刘新园考证此“建阳”当指水吉镇建窑生产的青白釉产品‹5›，也有学者认为“建阳”可能是建阳华家山窑‹6›。笔者更倾向于认为蒋祈在当时并未指代具体某一窑场，而是以此说明临川、建阳、南丰三地构成的青白瓷生产区，挤占了景德镇的青白瓷市场。建窑在南宋后期放弃了黑釉器的生产，转而加入这一青白瓷生产区，可能是在社会经济整体衰落，建窑黑釉器受阻的情况下，青白瓷相较黑釉瓷产量更大，成本更低，同时丰富的日用器类更能够确保生产的瓷器可以向外销售。

建窑在南宋晚期完成如此彻底而迅速的转变，说明以往认为的饮茶方式变化并非直接原因，而是建窑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做出的调整。南宋著名理学家陆九渊，曾对故乡金溪的陶瓷业如此记载：“金溪陶户，大抵皆农民于农隙时为之。事体与番阳镇中甚相悬绝。今时农民率多穷困，农业利薄，其来久

‹1› 傅宋良、王上《邵武四都青云窑调查简报》，《福建文博》1988年第1期，第19—22页。

‹2› 陈邵龙《将乐古陶瓷发展与“将乐窑”的特征》，《福建文博》2016年第4期，第18—26页

‹3› 朱凯《福建三明中村宋元窑址相关问题再探》，《福建文博》2017年第3期，第38—41页。

‹4› 陈孝昭、宋良《泰宁新桥窑址调查》，《福建文博》1991年1—2期，第72—78页。

‹5› 刘新园《蒋祈〈陶记〉著作时代考辨——兼论景德镇南宋与元代瓷器工艺、市场及税制等方面的差异》，《景德镇陶瓷》1981年第10期，第5—35页。

‹6› 林忠干《关于蒋祈〈陶记〉所载的“建阳窑”》，载中国古陶瓷研究会编《中国古陶瓷研究》第四辑，紫禁城出版社，1997年，第97—108页。

矣。”[1]由此可知前述金溪里窑、小陂窑的兴起，应是当地百姓因贫困而自发组织生产。而建窑转向青白瓷生产，也可能是在南宋晚期社会经济凋敝下做出的被动选择。这同样也启发我们，在探讨南宋晚期景德镇青白瓷技术传播，青白瓷窑业体系扩张的问题时，需要思考其背后的历史背景，可能并非是传统认知上的地方经济发展带动制瓷业兴起，而是地方经济倒退导致向制瓷业集中的特殊现象。

四　结语

本文考察了水吉建窑自晚唐五代到宋末元初的发展过程，该地区晚唐五代的瓷器生产，是基于闽浙赣这样广泛的陶瓷生产区之中。而到了北宋中后期，建窑抛弃了青釉生产传统，转而大规模专门生产黑釉产品，其原因不仅在于茶风或供御，还缘于城市士民的大量需求，生产的建窑黑釉瓷再借由城市散运至各地。建窑的衰落以往被认为在元代以后，前文分析可进一步提前至南宋后期。而其衰落的原因不仅在于饮茶方式的转变，更在于南宋社会经济衰落，建窑黑釉瓷销售受阻，被迫转向青白瓷生产以抢夺原有市场。

通过以建窑为个案，结合以往考古工作中对福建及周边地区黑釉瓷窑址产品组合的认识，本文对“建窑窑业兴衰”与“建窑黑釉瓷生产兴衰”两者分别进行分析，从考古学角度对这一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但笔者的研究仅是初步，唯有通过更多的考古工作，进一步了解建窑及其他黑釉瓷窑址的生产情况，才能全面系统地了解这一时期黑釉瓷的生产，得出更加合理完善的认识。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生）]

（责任编辑：陈文曦）

‹1›　（宋）陆九渊《与张元鼎》，《陆九渊集》卷一〇，中华书局，1980年，第269页。